



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与融合

何国华 袁仕陈

摘 要：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即人民币对内贬值而对外升值，造成了当前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分割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因此，不能总是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围堵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而更应该从源头来进行疏导。

关键词：人民币；内外价值；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结构；制度缺陷

一、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内涵

任何货币都存在着两种价值：一种是对内价值，即货币购买力，通常用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来表示；另一种是对外价值，体现为一国货币汇率水平的高低。理论上，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该是同向的，因为本币的贬值意味着本币供给过多，后者又会造成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对内价值的下降。然而，在现实中，货币的内外价值往往存在着冲突，并因此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行造成两难选择。

近年来，我国国内物价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房地产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通货膨胀压力急剧增加。2010 年以来更是如此，其中 8—11 月份 CPI 同比分别增长了 3.50%、3.60%、4.40%、5.1%。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明确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为 3%之内）作为今年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由表 1 知，2010 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表 2 则表明，作为衡量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指标，自 2000 年以来广义货币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在 1.5 以上，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常在 0.5 以下）的水平，可见我国潜在的通胀的压力一直在积累。这意味着人民币正在不断对内贬值。

表 1 2010 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月份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CPI ₁	101.5	102.1	102.2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2
CPI ₂	101.5	102.7	102.4	102.8	103.1	102.6	103.3	103.5	103.6	104.4	105.1

注：CPI₁为上年同期=100；CPI₂为上年同月=100；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表 2 2000—2009 年我国广义货币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比例	1.54	2.41	2.10	1.64	1.85	1.62	1.60	1.51	1.51	1.8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计算获得

与此同时,由表 3 可知,2009 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却在不断下降,即人民币不断对外升值。截止 2010 年 12 月 28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为 662.52,与 2005 年 7 月汇率改革时的 827.65 相比,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高达 25%。

表 3 2009 年 1 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期平均) 人民币元/100 外币

时间	2009—01	2009—02	2009—03	2009—04	2009—05	2009—06	2009—07	2009—08
汇率	683.82	683.57	683.41	683.12	682.45	683.32	683.20	683.22
时间	2009—09	2009—10	2009—11	2009—12	2010—01	2010—02	2010—03	2010—04
汇率	682.89	682.75	682.74	682.79	682.73	682.70	682.64	682.62
时间	2010—05	2010—06	2010—07	2010—08	2010—09	2010—10	2010—11	2010—12
汇率	682.74	681.65	677.75	679.01	674.62	667.32	665.58	

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库

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给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了一个两难选择:控制通货膨胀会引起人民币的升值,而控制人民币升值却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这是因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需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中卖出债券以及提高市场利率等方法大幅紧缩货币。但是,提高准备金率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债券的举措将直接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而提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这都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为了控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又需要不断购买超额外汇以人为实现外汇市场的供求平衡,但这无疑会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起到扩张货币的作用,从而抵消其治理通货膨胀的努力。

由于 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的币值稳定,对内就是指物价总水平稳定,对外即指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因此,目前我国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和人民币不断对外升值并存的格局事实上表现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失效。

二、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直接原因

大多数的研究文献都将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存在的两难选择问题归结为汇率制度的僵化,并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完全浮动来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之间的冲突,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克鲁格曼提出的“不可能三角定理”。然而,本文认为,我国现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仅仅是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直接原因和现实表现,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是否允许汇率完全浮动,而在于消除这些扭曲和缺陷。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不可能三角定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则货币政策将失效。这是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假定一国中央银行试图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将会促使利率上升,而利率的上升又会导致国外资本的不断流入,本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反映在外汇市场上就是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从而使本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将不得不购买超额外汇,结果使货币供给量又回到原来的状态,紧缩性货币政策失效。

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一国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就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目标,就必须以严格的资本管制作为前提条件。

历史上的国际金本位制时代,许多国家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今天的欧盟也是如此)。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各国则是在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的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了严格限制^①。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在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汇率稳定”目标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①直到 1986 年开始,西方各国才逐渐开放资本项目,见 M. Klein, et al.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Depth, and Economic Grow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Working Papers* 1999(6).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选择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严格控制“资本自由流动”。但是,随着我国在1996年12月宣布实现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并于2002年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流入我国,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并由此造成人民币外汇占款持续增长的局面,表明中央银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

为了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再次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在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的同时,决定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问题是,汇改后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尖锐了。事实上,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蔓延之前,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问题就已经凸现出来,当时我国的货币政策就面临着既要控制人民币升值又要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只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才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标。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每日仅允许0.3%的波幅,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汇率日波动幅度也控制在1%之内,仍然是波动不足而管理有余,因此,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改革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并没有本质区别,从而也就无法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问题。

那么,是否实现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就一定能够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呢?众多的研究表明,在本外币资产存在相互替代的情况下,即使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也不能保证货币政策必然有效。Bordo与Choudhri认为,如果货币替代严重,较小幅度的货币供应的变化也可能造成严重的汇率超调现象,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①。Joines和Thomas认为,如果私人部门把两种货币看作生产货币服务的可替代的投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持有一种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将导致两国对另一种货币的需求增加,从而会引起另一种货币跨国界的流动,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控制权的丧失^{②③}。Rogers指出,对于一个实行浮动汇率的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会丧失对外国价格冲击的阻隔效应,外国通货膨胀被传递到本国。并且,国内外币实际余额的初始存量越大,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越大;对外币的需求弹性越大,通货膨胀传递效应也越大。在此情况下,本国货币当局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将会丧失独立性^④。

而我国学者邓乐平、冯用富、晋重文(2002)指出:伴随着金融进一步开放,我国将长期存在着货币替代现象,外币实际余额的初始存量和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弹性也将增大^⑤。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效应将会增强,即使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也不能有效阻隔外国通货膨胀向我国传递。因此,允许汇率自由浮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但并不能真正消除人民币内外价值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虽然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直接造成了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却并非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根本原因。

三、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

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现行经济结构扭曲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分割制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必然结果。

(一) 经济结构二元化与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特征日趋显著,主要体现为:东西部经济的二元化、城乡经济二元化、工农业的二元化、所有制结构二元化以及内外贸易的二元化。

①M. D. Bordo et al. "Currency Substitu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Some Evidence for Canada",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82(6).

②H. Joines Douglas.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ubstitution and the Income Velocity of Mon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85(4).

③Lee R Thomas. "Portfolio Theory and Currency Substitu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85(8).

④Rogers John. "Foreign Inflation Transmission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and Currency Substitu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0(5).

⑤邓乐平、冯用富、晋重文:《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载《金融研究》2002年第3期。

1. 东西部地区经济二元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率先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不但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给予众多的优惠,国家的各种资源,如资金、人力、物力等也不断地投向东部地区。在这一战略下,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经济特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上的交通便利、经济和金融环境、政府扶持力度、吸引外资等方面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逐渐拉开,并逐渐演化成目前区域经济的二元化格局。

尽管近年来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但依旧难以迅速扭转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二元化格局。例如,“十五”期间,中国西部九省累计吸引外商投资越100亿美元;而仅仅2005年一年,东部地区的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到账就达到132亿美元。又如,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总投资为95653亿元,比上年增长23.0%;中部地区总投资为49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5.8%;西部地区总投资为496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1%。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投资总额仍然相当于中西部地区投资总额之和。

2. 城乡经济二元化和工农业二元化

众所周知,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实行的牺牲农业以促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长期萧条,农民贫困,从而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城市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迅速缩小。例如,1978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172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2%;农村总人口为790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08%。而2009年,我国城镇总人口达到6218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为46.6%;农村总人口为712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为53.4%。

但是,目前城乡经济二元化和工农业二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例如,2009年我国城镇投资总额达到194139亿元,而农村投资只有30707亿元;城市消费品零售额达到85133亿元,而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只有4021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153元;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6.5%,而农村居民家庭仍然高达41.0%。

3. 所有制结构二元化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化不但表现在产业和企业结构、企业规模和产值等方面,也表现在金融市场上,特别是体现在信贷市场的分割上:目前我国的信贷市场依借贷主体的所有制和规模分割为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垄断市场和以非国有中小商业银行、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薄弱市场。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化,本身资金雄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但可以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而且可以在信贷市场上轻易地获取大量优惠的信贷资金,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而提供了绝大部分就业岗位且效率更高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既得不到财政的扶持,也难以通过国内信贷市场获得信贷资金,更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4. 内外贸易的二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导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日益严重的二元化:大量的资源从非贸易部门流向贸易部门,造成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供给处于相对过剩状况,而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品供给处于相对不足的状况,由此导致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

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催生了众多的不协调音符:劳动和各种资源不断地由西向东、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由非贸易领域向贸易领域流动,在造成西部、农村、农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和非贸易领域各种资源严重缺乏的同时却造就了东部工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贸易领域资源的严重过剩。这些所谓的过剩资源在为我国创造巨额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构成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在快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甚至破坏环境的同时却导致国内能源、各种原材料和房地产等价格的不断上涨,从而为我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埋下了伏

笔。在导致我国西部与农村经济和农林木渔业萧条的同时却导致了我国家电、纺织和服装等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从而推动了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形成。在造成我国中小型企业 and 民营企业资源匮乏的同时却构成了我国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投资过剩。流动性过剩不但为通货膨胀提供了保障,而且自身蕴含了巨大的风险。

(二) 收入分配两极化与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

2010 年中国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两极化无疑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无论是在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都在不断扩大。财政部的最新调查表明,尽管我国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很大,约占总人数的 64.30%,但 10% 的富裕家庭却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 45%,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1.4%。另外,20% 的高收入和 20% 低收入户的倍数也在不断增大,在城镇是 8.9 倍,农村是 6.7 倍,平均在 7 到 8 倍左右。地区之间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倍数 1985 年大概是 2.07 倍,2001 年是 2.75 倍,2008 年则为 2.69 倍。从行业来看,1978 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 2.1 倍,2000 年是 2.6 倍,2008 年上升到 4.77 倍。而作为衡量总体收入差距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自 1984 年以来一路攀升,2007 年已达到 0.473。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 0.2 之下一般叫“高度平等”,0.2 到 0.4 叫“低度不平等”,0.4 以上叫“高度不平等”,我国 0.473 的数值无疑说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1.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未能有效调节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的收入分配比例,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53.4% 下降为 2007 年的 39.7%,10 年累计下降了 13.7 个百分点。在一些企业高管的工资成千上万倍地增长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一般企业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而且很长时间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09 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9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9%。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 1417 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800 至 1200 元的占 31.5%,1200 至 1600 元的占 33.9%。这样的收入水平,基本上只能维持温饱。

2. 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化

计划经济时代诞生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割裂,一国两策。同样的中国公民不仅被分为城市人与农村人、外地人与本地人,而且他们在税收、上学、买房、投资、参军、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天壤之别。农村公民相对于城市公民、外地人相对于本地人,无论在规则、机会还是结果等方面都长期处于绝对不公平的状态。尽管他们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重任,却依然长期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最底层。

3. 土地和其他资源垄断

土地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国的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则归集体所有。然而,作为国家主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都未能享受到土地所带来的丰厚的回报。全国几乎所有的土地租金都为土地所有人的代表——政府——所垄断。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强制搬迁,将土地收归政府后进行投资或拍卖获得了巨额资金^①。但是,这些资金却并未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为全国人民创造相应的福利。而作为国有其他资源的主要垄断者,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②。但每年高达上万亿的资本红利却没能上交国库,企业外的其他国家主人更没能分享到一点红利报酬。国有资源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器完全掌握在国家主人的代理人的手中,国有资源红利也转化为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巨额储蓄。

① 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为 14239 亿元。

② 2010 年 1 月 19 日,财政部公布 2009 年 1—12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12 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25087.3 亿元,同比增长 5.9%,累计实现利润 13392.2 亿元,同比增长 9.8%。

西方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高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往往高于低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因此,我国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和中低收入人群占比过大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和国民储蓄的持续增长。而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无疑是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升温的原动力。另外,根据凯恩斯理论构造的国民收入恒等式表明,经常账户差额=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由于投资增长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我国经常账户必然会由于国内储蓄的不断增长而大于国内投资形成持续的顺差,再加上以直接投资为主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促使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大,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人民币升值。

(三) 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与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逐渐走向市场,居民在各个方面的预期支出越来越大,而就业的市场化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则导致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又尚未建立完善,尤其是农村严重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使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不断强化,储蓄存款快速增长,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目前已上升到 46%,而 7 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平均的人均储蓄率只有 6.4%^①。

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不仅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而且使得我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所实行的扩大内需政策演变成单纯地扩大投资的政策。而我国投资率始终处在较高水平,投资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大,2003 年以来已经连续 7 年在 40% 以上,2009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高达 6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表 4 2000—2009 年我国投资占 GDP 的比重(%)

年 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投资/GDP	33.3	34.1	36.3	40.8	43.9	48.0	51.0	51.7	61.4	67.5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但是,投资的增加通常都伴随着信贷需求的增加,投资的增加也会带动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此外,投资的增加还具有二重性特征:短期内投资的增加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但长期来看又会使生产能力提高,其结果是使我国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进而使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更大。

(四) 财税分割与人民币内外价值冲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分割制度使二者在财权和事权呈现出严重的不匹配。资料显示,目前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 60%,地方占 40%;而中央财政支出占 30%,地方财政支出则占 70%。地方财力和事权严重不相匹配的状况日益严重。

地方政府为维持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但地方财政却极其窘迫。为此,各级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投融资平台来融通资金。中央银行的调研结果显示,截至 2009 年 5 月末,全国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 3800 多家,总资产近 9 万亿元,负债升至 5.26 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 60%。这 5.26 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 2009 年全国 GDP 的 15.7%,相当于 2009 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7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 161.35%。

但是,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为了偿还本息和继续获得贷款,地方政府只能将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融资平台还债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2001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过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 16.61%;而到 2006 年,这个比例则到了 50.92%,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竟占财政收入的 70%。

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保持较高的土地价格和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否则,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就将“破产”,地方金融也将因为巨额的呆坏账陷入困境。地方政府的这种借债开发、卖地还债的城市建设模式将地方政府进一步捆绑在了土地财政上,从而造成地价、房价居高不下^②,并进一步推高了物价水平。不仅如此,地价和房价居高不下,还促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国民储蓄率提高,并诱使更多的热钱流入,

①孙霄翀:《从央行的两难困境谈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载《工业技术经济》2007 第 11 期。
②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从 2001 年底的 17.4 万亿元上升到 2006 年底的 35.2 万亿元,城市住房价值/GDP 到 2006 年上升到 168%。

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四、人民币内外价值的融合

既然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冲突根源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就不要总是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围堵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更应该从造成二者的源头来进行疏导。

(一) 短期内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

1. 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措施(包括调整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进一步收缩流动性,减低通货膨胀,并通过货币对冲来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还可考虑通过征收托宾税来协调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

2. 改变进出口政策,将出口优先调整为进出口并重,增加进口,防止经常项目顺差的过度增长;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迫使部分耗材型、污染型、低效率出口企业改变增长方式或退出市场,推动更多高利润、环保型和竞争力强的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引导和控制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量、方向、区域和类型等,同时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

3. 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高房价。首先必须利用各种政策和措施降低人们对房价的增长预期;其次,必须规范房地产市场,减少市场的投机行为,尤其是规范大型国企投资房地产的行为,防止地王频出;再次,增加廉租房和公房的提供和配套措施建设,调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数量;最后,进一步完善土地供给制度,增加土地供给。

4. 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合作,影响国际投资者预期,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 中长期内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消除造成不平衡增长、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障碍

无论是通过调整准备金或再贴现率等来收缩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或是通过货币政策对冲来稳定汇率,或者是通过打击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来降低房价,或者是通过增加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和通过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控制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增长等等都是在打狙击战,目的在于赢得时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1. 消除城乡分割、金融市场分割等二元体制因素,引导各种资源流向瓶颈产业和待发展地区。尤其要通过信用制度建设和差额准备金率等引导资金,满足中农业、农村、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资金的要求。

2.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内需,促使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同时并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 推动财税体制改革。首先要改革税收结构,将地价所得收归中央,同时开征房产税,归地方使用,使地方政府不再以高价拍卖土地、转嫁住宅配套设施来维持地方财政运转。其次,必须改革当前分税体制,解决地方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收入的情况,并对农村、农业及其他亟待发展的领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4.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国有资源的市场定价问题和资源配置问题,充分利用价格机制,通过竞争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 作者简介:何国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袁仕陈,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大学财经学院讲师。

■ 责任编辑:于华东